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元明清文选

申远初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北京京联图

发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元明清文选

申远初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元明清文选 / 申远初选注.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乔力主编)

I. 元... II. 申... III. 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元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明清时代
IV. 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1420 号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元明清文选

申远初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 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5 印张 312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680-179-0 / I·098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007)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顾 问	王运熙	邓绍基	吴宏一	陈华昌	杨雨前
	张 炯	傅璇琮			
主 编	乔 力				
副主编	邵 东	胡大雷	黄道京	葛承雍	

编纂委员会

丁少伦	马自力	马 奕	门 岿	方智范
王定璋	王英志	甘 英	刘文忠	刘庆云
刘怀荣	刘扬忠	刘明浩	刘峰焘	许 总
乔 力	池 倩	朱晓晨	杜贵晨	李 方
李少群	吴兆路	吴章贵	张玉璞	张亚新
张光芒	陈庆无	陈如江	陈洪宜	杨 明
杨 政	欧明俊	武卫华	施议对	周满江
周锡山	赵永纪	赵敏俐	胡大雷	荣 斌
洪本健	高 巍	聂言之	崔海正	桑林佳
徐其超	曹顺庆	章亚昕	黄道京	黄 霖
寇养厚	韩 毓	郭 丹	葛承雍	程郁缀
管士光				

总 序

乔 力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的承传负担。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什么?究竟怎样读?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专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利目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心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那么,已然产生凝定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从整体上展现自远古

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至最较晚近的 1949 年以前的所有中国文学产生、发展、丰富、极盛而蜕变新生的流变轨迹与大略面貌。使人们在直觉审美感受的过程间,获取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学知识,熟谙洞悉它的每个结构成分。另一方面,也借助横向共时性的断面取舍,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传现那些关于文学本体以及某一特定文体样式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精神;并因其创作巅峰的最绚丽景观所辉耀的最大可能性范型价值,或由一定的阶段空间所显示出的一定更代嬗变类型。要言之,它们既包容有当时的复杂社会现实的典型意蕴,同时又未曾丧失、消解掉充沛张扬的现代生命活力,乃是屡经时间长河的荡涤淘洗,以代积层累方式架构起巍峨的中国文学经典大厦。它千门万户、千姿百态,永远流闪着辉煌璀灿之光。

下面再就《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的诸有关事宜略为阐明:

——首先是读者定向。我们关注的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着的白领蓝领们与所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最广泛的读书界朋友。衷心希望《中国文学经典书库》能成为你们的“精神家园”,为你们不断追求探索的焦灼心灵伸展开一片清新温馨的绿荫,吹进青春热情的气息。

——其次是编纂的框架构想和意图。这里自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部分。具体而言,每种精选本前皆首先设置“导论”,概述本文体于此书所界定之历史时段内的演进行程和重要业绩,并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上,论析其表现特征、思想内涵及主流艺术精神;进一步阐述因整个文学现状与此特定文学样式自身运动规律所生成出现的创作流派、风格面貌。而以后的篇幅,则以选录的作家作品为单元。“作家简介”除却例行的生平行迹说明外,特别注重其文学活动及与文体相关的创作情形,目的在于强化“评论”色彩,由之使这种个案的微观烛照同“导论”的具体文体现象的中肯评析,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书库》收入的《中国文学

史》中的“总论”《中国文学流变概说》所作的宏观把握,形成为点、线、面纵横交织、互相呼应的框架结构模式。至于选录作品,首先认定的是审美价值——一种纯文学本体的意义,然后就艺术创造性来统领其他社会教化等内涵,求得两者的有机融合。其后的“品鉴”,则无论总瞰俯览、远察旁涉为印证而生发妙境,还是探幽抉微、精擘细辨以臻达澄彻洞明之胜地,抑或径从个别主旨、意趣、背景来进行阐释考订,均系视各自实情的需要落笔,并不强求规范一致。相反,我们倒是力求多角度、广视点的繁色纷采,精当出新。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除却主体的作品部分,还另有五种既断代又互为联续衔接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各自具载相对独立性,但整合总观之,则成为从先秦直及现代的通史。考虑到前面主体部分既有的“导论”、“品鉴”及此书中的《中国文学流变概说》,已经构成的交错呼应的网式框架所涉及过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便于改变、拓展视野,故这部文学通史则侧重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上整体文学面貌的宏观把握,注重描述其行进过程中产生的艺术流派及创作风格、文学思潮、重大现象等,尽可能地弱化一般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当然,在总则方面遵循这种撰写精神的基础上,各断代文学史也有各自的特点,方式方法并不求整齐划一。

——另外,作为一部集体协力撰写完成的大型丛书,我们一直强调贯穿通体的连续谐调指向,故而与另一类的个体研究著作同样承载着严肃的责任感。应邀参加的多为学术造诣深厚精湛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山西、江苏、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各地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和专业研究机构,其中有些熟识并在我主编的另一些丛书、书系里多次合作过,有的却是首次共事。但无论怎样,我们大家都抱有事业与友情并进的相同宗旨,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途程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留下一段美好愉快的记忆,以慰藉那本原性的苍凉。

上个世纪初,值当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五四”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大智慧、大学识、大勇气,奋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僵化、因循守旧陋习,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倡扬“民主”“科学”精神,吹进来健康新鲜空气,以永远的青春和激情开启一代新风,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每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今又值新世纪伊始,考量已往,眺望前途,将会作出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是该出现文学文化大师、学术巨人的时候了。但现今触目所见,太多了些掂斤称两的匠人雕琢的小家子气。就一定意义而言,大师巨人的产生需要最广泛普遍的、适宜的文化基础与时代土壤,但适宜的基础、土壤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培植。那么,就让我们脚踏实地,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文化学术素质起始,作一些消除浮躁之气、纯净人们心灵、积累培植基础的工作吧!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人传·贝多芬传》的“译者序”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该有更深刻的意。”我想,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一种新的演绎。由是言之,除却工艺技能与客观科学知识的训练、学习外,文化文学素养的充盈提高,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同着新世纪的朝阳前行,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这既是幸运,也更是历史的使命——《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便是最新一份工作成果,愿新世纪的人们喜欢它。

无庸烦言,限于学识和精力,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教正,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铭感之情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2004年春于北京旅舍

导 论

文学史上,提到元明清三代的文学成就,往往以元曲和明清小说概之。由于唐宋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出现了“唐宋八大家”,元明清散文的色彩似乎被荫蔽了。但是,元明清三代中明清两代的散文,却是颇具各自特色的。若以流派之众多,题材之广泛,体裁之多样,作者之辈出而论,也显得丰富多彩。

—

元代散文,过多地模拟唐宋之作,形式上没有什么创新,也较少能够使人引起共鸣的思想内容,与元曲相比,显得黯淡无光。但少数作家在散文上仍有一定成就。

元代前期作家,散文上较有成就的有刘因、赵孟頫、邓牧、戴表元等。这些人由宋入元,亲历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江山易代,作品中流露出一些亡国之痛和民族气节,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刘因的《孝子田君墓表》,揭露了蒙古兵南侵金朝,血腥杀戮保州平民的罪恶行径。《辍川图记》在抨击王维时,倡论风节,与江山易主,世事变幻不无关系。邓牧的《二戒·越人遇狗》,借越人纵容猎犬招致杀身的故事,隐寓宋朝和金、元妥协自取灭亡的惨痛教训。《楚倭鬼》,嘲讽了元朝的统治者及其依附者。戴表元的《送张叔夏西游序》,对南宋名将之后的词人张炎历经家国之变,身世沦落的处境寄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元代后期文人如萨都刺、杨维桢,虽以诗词名世,却也有散文

流传。如萨都刺的《龙门记》，杨维桢的《干山志》等。

二

明代二百七十年间，曾出现过初期的经济繁荣，自中叶起更出现过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明代封建专制主义也发展到了顶点：通过提倡程朱理学和实行八股文取士加强思想和文化的专制统治；通过设立特务机关，登记户口和杀戮等手段对人民实行严酷的控制；中晚期更形成宦官专权。加之赋税、徭役的日益沉重，致使农民起义不断，明王朝最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在这样漫长年代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存在的明代散文，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和众多的文学流派。

明初的宋濂、刘基等作家，亲历了元末大动乱，目睹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接触到广阔的现实生活，写下了一些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宋濂专长散文，《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杜环小传》等都是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传记文。《送东阳马生序》描述苦学生活，富有教育意义，写得很生动。《文原》论文主张义理、事功、文辞的统一。另外还有两部寓言体散文集《燕书》和《龙门子凝道记》，其中有些作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还有不多的写景散文，如《桃花涧修禊诗序》、《环翠亭记》等。《阅江楼记》虽是歌颂新朝之作，却也反映了明代开国初年蓬勃兴旺的气象。

刘基在元末所写的寓言散文集《郁离子》，有许多文章在客观上起了揭露和谴责统治阶级腐朽、欺诈、贪婪的作用。其中有一些小品文，抒写愤世疾俗之情，表达了他的进步思想。《卖柑者言》深刻地揭露了元代官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明代前期，统治文坛的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雍容典雅的“台

阁体”。代表人物是宰辅权臣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些人的文章为维护封建统治而作，形式华靡，内容贫乏，艺术上亦无多可取之处，给文学带来严重危机，引起了一些文人学士的不满。

明中叶以后，社会矛盾激化，外患频繁，明王朝的统治发生了严重危机。社会的动荡变化，引起了文坛的变化。从明宪宗成化年间到明穆宗隆庆年间（1465—1572）的一百余年中，文坛上出现了一场复古运动，这场运动给文坛带来了变化，使曾长期占据明前期文坛统治地位的“台阁体”失势。倡导并实际参加这场文学复古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文学史上通称的“前后七子”。

弘治年间，“前七子”首先树起“复古”的旗帜，声讨“台阁体”。“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还有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很快形成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文学运动。嘉靖年间，“后七子”继起，把文学复古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还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后七子”继而掀起的复古新高潮，终于使“台阁体”彻底崩溃。

“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是为了矫正“台阁体”的恶劣文风，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他们一味强调“文必秦汉”，盲目崇古，拟古，并且只着眼于形式上的拟古，又被称为“秦汉派”。由于他们少创新，这就使得其文章缺乏自身的文采与特色，削弱了艺术感染力。因此，这场文学复古运动，不仅未能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相反，却把文学引向了另一条错误的道路。李梦阳和王世贞到了晚年的时候，虽已意识到他们盲目拟古的一些弊病，并有自悔之意，但风气已成，流弊已无法挽回。当然，“前后七子”也有一些佳作，如“前七子”何景明的《说琴》，由物及人，以小见大，阐发培养和使用人才的道理，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可称道。“后七子”宗臣的《西门记》，文辞简洁，内容真实生动。他的《报刘一丈书》，描写官场丑恶淋漓尽致，是明代散文中的佳

作。

嘉靖间崛起的“唐宋派”，是作为“前后七子”的对立派而出现的。他们推崇唐宋古文的成就，力矫“文必秦汉”，与复古派文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文学流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代表。其中以归有光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突出。归有光一些记事抒情散文，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皆“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虽然写的是平凡琐事，却抒发了浑厚之深情，文笔描写也生动形象，极富感染力。归有光的散文创作是他文学思想的具体反映。他反对盲目崇古、摹拟剽窃的文风，主张作文要独树一帜。针对“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极力推崇《史记》及唐宋散文，提倡文章要文从字顺，反对写佶屈聱牙的艰涩之文。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回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由于“唐宋派”的文学主张强调在学古基础上有所变化，作文一般较平易通达，对后世的影响远过于以“七子”为代表的“秦汉派”。然而，“唐宋派”也有自身的弱点，一些文章道学气较重，所学古人处也较肤浅，往往采取评点的方法论文，只停留在文章的开合起伏，起转承接上，如茅坤的《八大家文钞序》、唐顺之的《与茅鹿门主事书》等。就是归有光的散文也有不少的缺欠，他的大量应酬之作，枯燥乏味，受拟古主义、八股文的影响也很深。

“唐宋派”由于其本身理论主张的有限与文学成就不高等原因，使得反复古运动实际收效并不显著。直至李贽和受他影响的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的出现，才使文风为之一变。

李贽是明代卓越的思想家，其思想具有强烈的叛逆性和战斗性，他不崇古，不信道，猛烈抨击理学，揭露假道学的虚伪，勇敢地向封建传统思想挑战。在文学方面他提出了“童心说”，认为文学不论今古，只论真假，凡有真实的思想感情的，就是有真心，有“童

心”的,不能以“时势先后”论优劣,有力地批判了拟古主义。他不仅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提出严厉的责问:“诗何必古选?文何必秦汉?”还针对“唐宋派”提出的“文以载道”的主张,强调了文章要出自真心,反对载道。李贽的散文,敢于创新,决不泥古,见解大胆,笔锋犀利深刻,给后来使明代文风真正发生变化的“公安派”以深刻、直接的影响。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都是湖北公安人,文学史上便称他们为“公安派”。其中袁宏道受李贽的影响最深,成就最显,反复古拟古最力。“三袁”提出的文学主张与复古派针锋相对,而且与“唐宋派”立论迥异,具有反道学色彩,这就使他们在文学主张上显出进步性。在文学发展观方面,他们认为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自己的特色,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在创作上,他们竭力反对摹拟,认为既然文学随时代而发展,因此完全不必一味摹拟古人。他们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用以矫正复古派为古束缚的弊病,虽然有惟心成分,但却击中了复古派的要害。这个理论提出来之后,才确实扭转了复古的颓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体的解放,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公安派”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陈规定局,自然地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流利洁净,是他们作品的特点。但他们以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这就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往往脱离现实生活,很少反映现实的斗争,题材多局限于山水名胜,自己仿佛置身世外。这些写山水、名胜的文章,多为形式活泼自由、文字清丽可喜的小品文。另外一些书简、读书笔记体的小品散文,也写得真情畅达,语言流利洁净,活泼生动。

袁宏道是小品文的主要代表作家。其小品文以游记最为突出,文字清新活泼,文笔秀逸,主要作品有《初至西湖记》、《晚游六桥待月记》、《满井游记》、《虎丘记》等。《满井游记》最有代表性,全

篇仅约三百字，却把风物写得佳丽多彩，活画出一派北地寒冰初解的早春景色。在写景之中，显示出了他自己开朗、乐观的性格。另外，他写的《徐文长传》，笔墨酣畅，形象生动，写出了徐文长耿介孤傲的品质和反抗传统的人生态度。

与“公安派”同时反对拟古主义，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虽然也主张抒写“性灵”，但更多的是乞灵于古人。他们另辟一种“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形式主义的不良倾向。但一些游记散文也清隽可读，如钟惺的《游武夷山记》、《夏梅记》、《浣花溪记》和谭元春的《游南岳记》、《三游乌龙潭记》等。

“三袁”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对晚明和晚明以后的小品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现了小品文风行的局面。

晚明小品文最有成就是张岱。他融“公安”、“竟陵”风格之长独成一格。其小品文题材广阔，传记、游记、序跋、碑铭都有创作，均写得情趣盎然，幽默诙谐。晚年抱亡国之痛，作品意境更为深沉、苍劲，流露出追怀故国，眷念乡土的爱国感情。一些代表作品如游记《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西湖香市》、《绍兴灯景》等，历来被人所赞赏。最为人称道的《西湖七月半》一文，湖光月色，人情物态，写得维妙维肖、活灵活现。人物小品，也写得相当传神，如《柳敬亭说书》一文，将柳敬亭说武松打虎一节描述得入木三分，令人叫绝。徐宏祖一生遍历江、浙、闽、粤、滇、黔等省，所写的《徐霞客游记》，文笔清峭真切，既有文学性，又具有科学性，是不可多得的一部旅行记。

明代末年，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社会危机四伏，终于导致了农民大起义和清兵入关。许多作家都参加了这时的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文社“复社”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了。继与阉党斗争的东林党而起的“复社”文人，写下了反映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的作品。也写下了一些慷慨激昂，充满民族气节和爱国激

情的杰作。“复社”的创始人和领袖张溥，写了一篇很有名的《五人墓碑记》，反映东林党人与宦官的激烈斗争，歌颂苏州市民反对阉党的英勇战斗精神，强调匹夫之死“有重于社稷”，远非“缙绅”所能及，是一篇政治色彩浓烈，很有思想性的散文。复社的许多人物，在抗清斗争中，大都壮烈殉国，或退隐山林不与清廷合作，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留下的充满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的作品，给明代散文园地增添了光辉。

三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像明王朝一样进行封建专制统治。其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更甚于明：提倡理学，大兴文字狱，兴导考据学术之风，引导文人钻故纸堆，八股文取士制度更加腐朽。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一些文人学士的民主意识也在逐渐增强。自清军入关(1644)至辛亥革命(1911)凡267年间，清代散文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存在和发展。清代散文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富有哲理性和理论性的特点，正是当时时代特色的反映。

清初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全国各地的抗清斗争延续了几十年。在清初的抗清斗争中，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他们的文章，充满了反抗民族压迫和不忘故国的爱国感情。

顾炎武明末参加“复社”，明亡后念念不忘抗清复国。入清后不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他留给后世的名言。他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因此他的散文讲究实用，不作空言。在《复庵记》、《书潘吴二子书》、《吴同初行状》等文里，洋溢着为反抗暴虐侵袭，恢复汉人政权而斗争的激情和民族气节。著作《日知录》有三十卷，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包括了作者全部学术政治思想，对后代很有影响。

黄宗羲是明末复社主要成员，清兵南下，曾招募义兵抵抗。明亡后，隐居著述，清廷屡召不起。他学识渊博，尤精于治史。所作散文，内容充实，明白畅达。《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主要政论文著作，其中的一些著名文章，具有民主倾向，代表了他的先进思想。如其中的《原君》一文，激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政治，指出封建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乃天下之大害”；《原臣》一文，指出臣之出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种民主主义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是中国历史将进入近代时期最早的启蒙主义者，是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民主主义思想，对后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清初散文有成就的还有魏禧、侯方域和汪琬，合称清初散文三大家。三大家中，当以魏禧在文学上最有成就。他比较重视文学理论，认为要写好文章，重要的在于“积理”和“练识”，注意平时的积累和练习；不“依傍古人作活”，要注意自己的独创性；认为“文所以可传，中必有物”，比较重视文章的现实作用。他喜读史，尤其爱好《左传》。他的文章风格凌厉雄杰，刚劲有力，喜发议论，可见受史传散文影响较大。其名篇《大铁椎传》，在塑造大侠客的英雄形象时，又感慨人才的不为世用，就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他的文章常常表现出一种亡国之痛，在《许秀才传》中沉痛地说：“禧亦故诸生，方偷活浮沉于时，视二许能不愧死入地哉？”因此他的散文多表彰抗敌殉国和坚持节操之士，以人物传记文章为最突出，如《江天一传》、《高士汪风传》等。汪琬是当时有名的古文家，名声很高。其作品为求纯正，与魏禧雄杰凌厉的文风迥然不同。他继承儒家道统，具有正统的封建思想，因此作品也表现了思想上较大的局限性。但汪琬散文疏通畅达，确有佳篇，如《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等。他在思想上表现出一种对于故国忠义之士的缅怀与赞颂，写出了《周忠介公遗事》等名篇。侯方域少年时曾主盟复社，与东南

名士交游，声名很盛，入清后却参加了顺天乡试，三十六岁即抑郁而死。他的散文当时声誉很高，大体上是学《史记》的，文章主要以才气见长，但比较纤弱，正如他自己所说：“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侯方域也写下了一些散文名篇，如《李姬传》刻画了一个严正高洁的妇女形象，《任原遼传》刻画了一个抗清的平民百姓形象，《马伶传》记一个锐意进取的演员。这些散文在刻画人物方面学习唐人传奇，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从清初以来，以方苞创始到刘大櫟、姚鼐而树立一帜的“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因为方苞、刘大櫟、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

方苞首创“义法”说，作为文章纲领。他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可见义即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即指表现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即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具体地说，“法”即是要求文章取舍详略精当，结构布局合理以及语言文字的雅洁。他的《孙征君传》、《田间先生墓表》、《陈驭虚墓志铭》等文，无论是写一代大儒、明朝遗老，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都选材精当，颇能体现其剪裁的匠心。他的名篇《狱中杂记》记事很多，但都围绕当时的治狱之弊来写，多而不杂。这篇杂记，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专制统治的罪恶，对封建的法律制度作了最有力的控诉和抨击。

刘大櫟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说，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他所谓“神气”即文章所体现的风格特征。神气是抽象的，用刘大櫟自己的话说，是“文之最精者”，音节则是“文之稍粗者”，字句是“文之最粗者”，抽象的神气要通过具体的音节、字句去把握和表现，因而他的论文尤其重视音调节奏。他的《息争》、《观化》、《答吴殿麟书》等文章都写得气势雄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答周君书》一文，甚至插入韵语，以求行文的节奏和